

热点 点击

探索“以工代赈资产变股权”

我国扶贫有了新模式

本报北京12月22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今日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在开展以工代赈的过程中，将创新贫困户受益方式，积极探索“以工代赈资产变股权、贫困户变股民”的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

“通过以工代赈建设，充分调动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工程建设的积极性，严格落实劳务报酬，可以在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的同时，促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上述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印发了《全国“十三五”以工代赈工作方案》，明确将紧密围绕贫困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利益诉求，进一步提高以工代赈工程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积极探索创新工程组织建设、资产收益扶贫等新方式新途径，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以工代赈工作推向新的更高水平。

根据方案，我国将探索“以工代赈资产变股权、贫困户变股民”的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将以工代赈投入贫困村道路、水利设施等不宜分割的资产折股量化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参股当地发展前景较好的特色产业、旅游开发、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并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予以倾斜支持，使贫困户从以工代赈“佣金”单一来源收益向“佣金、股金”等多元收益转变。

全国发电装机达15.3亿千瓦

“十三五”电力供应宽松将常态化

本报北京12月22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了《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电力供应将进入持续宽松的新阶段。

我国电力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多项指标居世界首位。截至2015年底，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69万亿千瓦时，全国发电装机达15.3亿千瓦，人均装机约1.11千瓦。华北、华中、华东、东北、西北、南方六个区域各级电网网架不断完善，配电网供电能力、供电质量和装备水平显著提升，智能化建设取得突破，农村用电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全面解决了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动力转换，节能意识增强，全社会用电增速明显放缓。“十二五”期间开工建设的发电设备逐步投入运行，局部地区电力供过于求，设备利用小时数偏低，电力系统整体利用效率下降，我国电力供应将进入持续宽松的新阶段。

返乡人员领创办新型农业主体获支持

重点是强化产业引导

本报北京12月22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农业部今天召开支持返乡下乡创新创业工作视频会议。农业部副部长韩长赋表示，要把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作为战略任务来抓，鼓励返乡下乡人员领创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建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和股份制等企业等，搭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创新创业的公共平台，促进农村创新创业蔚然成风。

近几年，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同时，大批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农业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创新创业。据介绍，当前，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重点要强化产业引导。引导其主动对接新一轮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主动对接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主动对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金视界

腐竹香 农家乐



近日，江西吉水县水南镇西团村村民正在晾晒手工制作的腐竹。近年来，有上百年腐竹生产史的水南镇，利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在传承纯手工生产工艺的同时，扩大腐竹生产规模。目前，全镇腐竹年产量达200多万斤，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户均增收两万多元。 廖敏摄

深化改革 降低企业税费“痛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崔文苑

关于企业税负的讨论，已跳出简单的税负高低之争，更多是从税制、税费关系、非税综合成本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层次地思考如何降低企业税费“痛感”，更好激发实体经济活力——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一席谈，引发社会舆论对企业税负的讨论仍在发酵。“此次税负争论，确实有点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这是因为有关部门、学界、业界的大讨论，已经跳出简单的税负高低之争，开始从税制、税费关系、非税综合成本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层次思考如何降低企业税费“痛感”，让税收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税制不同 加重税费痛感

姑且不论统计口径是否严谨，对于产生“中国企业综合税负高于美国”说法的原因，不少专家均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同于美国。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美国则以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个人。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税负从整体上可能高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企业承担较多税负的实际，又决定了企业对税费痛感更加敏感。”杨志勇说。

认识误区、统计口径偏差，也会对企业“税收痛苦指数”造成误导。比如，所谓“中国综合税负高于美国35%”，就是将除了“正经”税收以外的用能、土地、保险费等综合成本，全当成税来计算。专家表示，确实有西方国家宽口径计算企业税负，将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入算进去，但国家之间税制不同，税基不同，很难生搬硬套别国口径。

还有一种认知误区，认为“税率是多少，企业就承担多少税负”。其一，这一说法忽视了税负转嫁因素。“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可以实现转嫁，企业只履行缴纳税义务，并非负担者。”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说。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举例称，如果销项税是100元，进项税是20元，应纳税是80元，就说这80元是企业税负并不准确。“实际上，100元销项可以转嫁到客户。此外，我国并没有要求购买方一定要负责进项税，那20元进项税也可以转嫁。80元应纳税额从现金流来看，企业并没有完全负担。”她说。

其二，应抵尽抵，能有效对冲税负。“增值税是中性的，在其链条上对产业、行业、企业都是有良好导向作用，改革需要完善的就是增加抵扣链条。”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说，一方面要增加可抵扣的范围，另一方面尝试留抵税额当期退税。

收费不降 影响减税效果

“公路超载这么多年都根治不了，为什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笑言，正是沿途收费多、物流成本高，部分车辆只得铤而走险通过超载来争取利润空间。

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不规范收费给企业运行带来的负担。“有些地方政府的收费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我曾作过一个统计，就房地产行业而言，相关收费就达97种。不少企业分不清楚，会把这些费统统当成税。”张连起说，这些随意性高、不规范性收费，带给企业的负担，远高于统一征收、较为规范的税。比如，一些地区行政审批前置的各类技术审查、评估、评价等存在中介服务项目多、收费额高，企业甚至抱怨“如果不找中介根本就通不过评估”。

在张连起看来，降费最应该关注的还有行政性事

业收费和各类政府性基金。比如，排污费、水土流失防治费、林地补偿费、社会抚养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比如，国家规定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这个比例是在职工人数的1.5%。“格力员工近8万人，要安排上千位残疾人就业才能免缴保障金。可在当地根本没有那么多残疾人，外地的残疾人又不太可能舍近求远来格力就业。”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由于安排的残疾人数不达标，企业每年都要缴纳数千万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对企业而言，税费感受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税减下来，但是费没降下来，企业仍会觉得负担过重。”张连起说，要消除企业税费“痛感”，清费尤为迫切。

“应该加快推进清费立税进程。”李万甫说，加大费改税力度，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收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的进程中，适时将某些收费项目并入到税改方案中，统筹实施；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结构中，通过费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确保地方财源稳固。

值得注意的是，收费项目并非越少越好，政府提供的普遍性服务要通过税收来筹集资金，但对特定企业、个人提供的非普遍性服务，让一般纳税人来提供资金是不公平的，应向特定收益人收费。举例来说，企业或个人办理护照，需发生护照印制、加装防伪标识、技术研发等费用，应由企业和个人来弥补成本。再比如，个人丢失身份证需要补办，就应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多措并举 降低综合成本

“当前，‘逢税必批’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事实上，这涉及中国自古以来对赋税的深层次认识问题。”岳树民说。

被广泛指责的税负，其实并非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的主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体制与机制不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发电企业产能过剩闲置，企业用电成本又很高，双方都有降低电价的需求。但当前电力体制却使这个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再比如，有些企业抱怨借贷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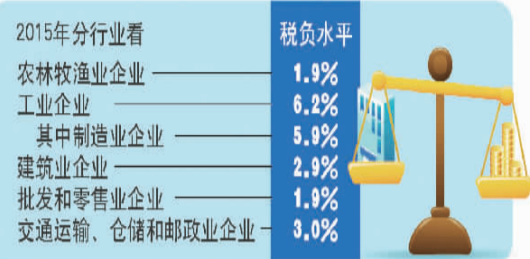
此外，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刘尚希表示，对一些企业来说，经济下行造成融资、人工、能源等成本不断上升，政府减税幅度不能覆盖其盈利缺口，税负容易成为“靶子”。

“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同时，也要综合考虑民生刚性支出和财政可承受能力。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养老、医疗、社保等，都要有稳定的财力支撑。减税，不能误伤民生。此外，企业自身也要多方施策，降低综合运行成本，不能只寄望于减税降费。”张连起说，引导企业家正向预期也很重要，对内，要稳住民间投资，对外，要控制大型资本外流。

在刘尚希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定调，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这就相当于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至于具体怎么减、哪个税种减，还要等待具体政策出台，这需要综合比较、反复权衡。从长远来看，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他说。

大数据详解企业税负 衡量轻与重不能以偏概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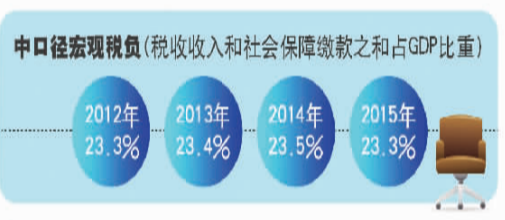
维度一：我国企业销售收入税负率为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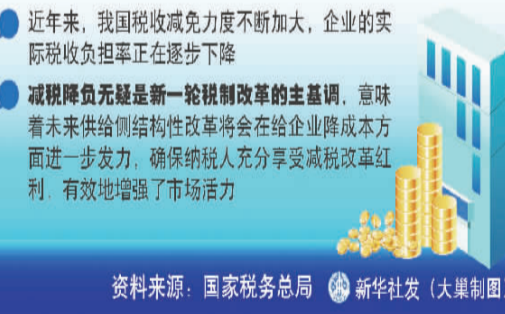
维度二：我国企业主要税种税率全球中等水平



维度三：我国宏观税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维度四：衡量税负高低不能忽视减税降费因素



下好先手棋 激活创新力 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 余颖

作日。至11月底，全国发放“五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233.5万张。

12月1日，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改革顺利实施。至12月19日，发放“两证整合”营业执照186.3万张。

为方便企业注册，国家工商总局还对企业名称核准实现全程电子化，并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试点工作。目前，10个省份发放了电子营业执照，18个省份开展了全程电子化试点。

针对许多创业企业不需要大面积办公场所的特点，国家工商总局还推动各地进一步放宽住所登记条件，释放住所资源，推动众创空间、创客工场蓬勃发展，激发出创业就业热潮。

专家表示，经过一系列改革，市场准入的制度性成本已大幅度降低。但也要看到，政府对微观市场主体的行政干预仍然过多，各种审批仍然过多，行政主导经济仍然过多，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经济发展活力。

“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我国营商环境极大改善，但在世界19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还比较靠后。”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明年将制定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清单和企业设立后的经营许可清单，确需保留的实行多证合一、证照联动，扩大“证照分离”试点，加快企业登记注册、注销便利化改革。“要按照国际先进水平开展对标行动，建立开办企业时间统计通报制度，把开办企业时间缩短了多少、审批流程简化了多少、办事成本减少了多少、群众满意度提高了多少，作为衡量商事制度改革成效的标准。”

据了解，围绕提高注册登记效率，国家工商总局正在推动明年3月份出台《关于推进“多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支持地方开展“多证合一”改革试点，有序实施“多证合一”。针对电商等互联网企业，还将全面推进电子营业执照的发放和应用工作，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标准规范的电子营业执照模式和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管理系统。

新闻深一度

今年，我国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社会投资创业制度性成本进一步降低，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

明年将制定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清单和企业设立后经营许可清单，确需保留的实行多证合一、证照联动

商事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从“五证合一”到“两证整合”，从企业名称核准全程电子化到发放电子营业执照……今年，我国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社会投资创业制度性成本进一步降低，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新设企业498.3万户，同比增长27.9%，日均新设企业1.49万户，超过2015年的1.2万户，企业活跃度保持在

70%左右。今年10月1日，“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全面施行。所谓“五证合一”，是指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五证合一，实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工作模式，申请人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时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向“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经测算，平均可为每家企业节约20个办证工